

當代社會多態文化的博弈格局 及其傳播戰略選擇

■ 荊學民

中國傳媒大學政治傳播研究所

■ 施惠玲

北京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一、現代社會轉型對文化統攝的期盼

對現代社會轉型的理解，說它是人的理想性的歷史自覺活動，還只是就它的深層的抽象的根本性質而言的。走出它的抽象的深層結構，從人類社會整體狀

在經濟動變的光影下，看不到社會轉型對政治、文化結構轉型的要求，會誤認為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就只是經濟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無限增長，社會轉型被完全地等同於經濟轉型。

貌流變的層面上審視現代社會轉型，就應看到，它既不是社會整體結構的某一層面或系統的發展與變化，也不是整個社會結構要素的僵硬的位移，而是一種社會結構的整體化轉型，即社會結構運作機制的轉型。我們認為，理解文化精神在現代社會轉型的運作機制中佔統攝地位，是把握這個問題的根本點。

自從世界性的從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現代社會轉型以來，多數以資本主義社會形式實現其轉型的國家和民

族，把社會轉型和社會發展近乎完全地理解成了經濟轉型和經濟增長；多數以社會主義社會形式實現其轉型的國家和民族，把社會轉型和社會發展近乎完全地理解成

了政治轉型和政治進步。前者可以稱為單純經濟轉型的社會轉型；後者可以稱為單純政治激變的社會轉型。

單純經濟轉型的社會轉型形成的深刻的社會基礎是，這些國家和民族的現代化過程是以經濟結構的改變和物質財富的迅猛增長為顯性標示

的。眾所周知，工業革命作為歷史發展的火車頭，帶領這些民族和國家乃至整個世界進入了邁向現代化的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人們看到，工業革命所造就的現代工業生產方式，使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樣，由於工業革命所造就的經濟效應的巨大遮蔽性，在經濟動變的光影下，看不到社會轉型對政治、文化結構轉型的要求，

摘要：本文探討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中國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多態存在形態。倫理性文化、政治性文化、經濟性文化、神聖性文化、現代性文化、後現代性文化的形態在目前的中國社會多元並存、交錯對接，使人們陷入文化選擇的迷茫甚至危機之中。因此，中國文化的自信與對外傳播，首先應著力解決選擇哪種文化作為目前中國社會精神支柱的問題。綜合考量，應當堅定不移地選擇立足於現代市場經濟的現代性文化。

關鍵詞：中國社會，多態文化，傳播戰略

會誤認為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就只是經濟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無限增長，社會轉型被完全地等同於經濟轉型。

單純政治激變的社會轉型形成的深刻的社會基礎是，這些國家和民族的現代化過程，是以政治制度的改變為顯性標示的。眾所周知，社會主義在一些國家和民族的實現與資本主義的實現形式恰恰不同，它不是以經濟制度的改變為開端，而是以政治制度在整個社會的強制確立為開端的。如果說，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程度不同地以社會主義的社會形式實現了其社會轉型，實現了其現代化，那麼，如同工業革命在資本主義的普遍實現中發揮了強大的作用一樣，政治革命在社會主義的普遍實現中同樣地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果說單純經濟轉型的社會轉型來源於對經濟結構變革的偏愛，那麼單純政治激變的社會轉型則來源於對政治結構變革的偏愛；如果說，單純經濟轉型的社會轉型所確認的社會運作和社會轉型機制，是以經濟結構的改變來帶動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的改變；那麼，單純政治激變的社會轉型所確認的社會轉型和社會運作機制，則是以政治制度的改變來帶動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的改變。

在經過數十年的社會實踐之後，以資本主義社會形式實現現代社會轉型的國家和民族，在它的經濟制度確立並有效地運作起來以後遇到的障礙是它的政治體制；以社會主義社會形式實現現代社會轉型的國家和民族，在它的政治制度確立並有效地運作起來以後遇到的障礙是它的經濟體制。與此相映成趣的是，資本主義在它的市場經濟體制由自由競爭時期的市場經濟，到壟斷時期的市場經濟，再到現代市場經濟，其不斷地改變和改革的是它的政治體制；社會主義在它的公有制的政治制度從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公有制，到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為基礎的公有制，再到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公有制，其不斷地改變

和改革的是它的經濟體制。這說明，偏狹的經濟轉型論和偏狹的政治激變論在實踐中都是行不通的。

應該指出，當前世界的多數民族和國家仍然處在現代社會轉型之中。就現代社會轉型的當代景況而言，需要在理論上提出注意的是，對於以資本主義社會形式實現其社會轉型的國家和民族來說，要防止其從偏狹的經濟轉型滑入另一端即政治激變論；對於以社會主義形式實現其社會轉型的國家和民族來說，要防止其從偏狹政治激變論滑向另一端即經濟轉型論。

這一點對以社會主義社會形式實現現代社會轉型的國家和民族來說，尤為重要。無產階級的精神頭腦是馬克思主義，正像一些人在過去極度片面地把馬克思主義的上層建築的反作用無條件地誇大從而導致社會發展政治激變論一樣，另一些人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發展的經濟決定論而信仰的。必須提醒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創立唯物史觀的同時就曾聲明，那種把經濟因素看作是歷史的唯一決定性的因素的觀點只不過是一種荒誕無稽和抽象無物的空話而已。在他們看來，社會轉型的「整個偉大的發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雖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經濟運動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決定性的），這裏沒有任何絕對的東西，一切都是相對的」^[1]。

單純經濟轉型的社會轉型論和單純政治激變的社會轉型論，其共同的缺陷是，沒有從社會整體性結構變革來把握現代社會轉型中的重要作用。這並不是說，像單純經濟轉型的社會轉型過程及單純政治激變的社會轉型過程就沒有它的文化精神的支撐，恰恰相反，前者是以「理性萬能」或按流行的說法是「工具理性」為它的文化精神的；後者是以「政治是統帥是

如果說，單純經濟轉型的社會轉型所確認的社會運作和社會轉型機制，是以經濟結構的改變來帶動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的改變；那麼，單純政治激變的社會轉型所確認的社會轉型和社會運作機制，則是以政治制度的改變來帶動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的改變。

靈魂」、「革命上去了，生產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的浪漫型政治信仰為它的文化精神的。這種所謂的文化精神雖然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有它特定的積極的意義，但從總體上是一種背離「人類社會發展是人的全面自由地發展」這種富有終極理想意義的文化精神的。

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對這種現代社會轉型和社會發展之文化精神的急切渴求，已成為世界性的社會轉型的國家和民族的普遍需要。而且，這些渴求和需要，已被一些敏感的心靈所捕捉，像韋伯的理論，不但以現有的事實為出發點，而且試圖重新反思當年引起西方世界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精神，表明他的從文化精神和實踐效應相結合的角度對西方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社會轉型的文化矯正和精神救療的積極的努力。像帕森斯和艾森斯塔德的理論，則是試圖從重新詮釋社會結構和社會運作機制以確立價值觀念在社會

目前的社會轉型，是社會整體結構之運作機制的轉變，即大體上可以理解為由「經濟—政治—文化」或「政治—經濟—文化」的機制模式向「文化—政治—經濟」的機制模式轉變。

轉型中的作用入手，來幫助人們重新建立使人的文化精神在社會轉型中的作用更為突出的社會發展觀。應該說，這些觀點和理論無論對於何種類型和處於何種階段的民族與國家的社會轉型，都具有非常實在的指導意義。

就此而言，我們應把問題的理解推進到這樣一個深度，即就現代社會轉型而言，實踐已經證明，那種偏重於經濟轉型的「經濟—政治—文化」的運作機制及那種偏重於政治激變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運作機制都是有較大的缺陷的。因此，目前的社會轉型，是社會整體結構之運作機制的轉變，即大體上可以理解為由「經濟—政治—文化」或「政治—經濟—文化」的機制模式向「文化—政治—經濟」的機制模式轉變。

當然，對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以文化為中心社會結構運作機制的觀點，並不能把

它理解成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決定論」。它主要蘊含著如下一些基本的思想。

第一，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經濟增長、政治進步和社會發展並不是一種目的，它們的目標是人的全面自由和全面發展。對人的全面自由和全面發展來說，物質財富雖然是基礎，但精神的自由和解放才是根本。精神自由和解放之理想境界的實現對任何一個社會而言，最終仰賴的是文化。

第二，自人類誕生以來，文化就是生產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腦力勞動和社會知識因素在社會生產領域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依賴於人的文化素質的提高。與此同時，文化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以及綜合國力諸要素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重視文化發展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已成為世界性的現象。因此，確立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中心地位的現代發展觀符合時代的潮流和要求。

第三，更具體地講，在現代社會中，經濟發展已由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為主轉向以人力資源和智力資源為主。社會生產的科技化和經濟管理的軟件化表明，經濟的競爭主要表現為人的科技素質的競爭，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日益取決於人的文化素質和能力的發展。文化對經濟及政治的強力滲透，有力地改變著過去的文化對經濟和政治的被動依賴機制而向以文化為軸心的機制轉變。第四，現代社會發展愈來愈由自發向自覺轉變，現代社會轉型本身就是一種自覺行為的過程。自覺是在某種理想目標牽導下的自覺，而對社會理想的持有和把握依靠的正是文化，因此可以說，整個社會結構的運作都是在某種文化力量的牽導下的運作過程，這樣的過程不能不確立文化在它的運作機制的中心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這已不僅僅只是一種我們在理論上的熱情和想望，而已被現代社會轉型的事實所證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

問拉茲洛，通過對至今經歷了「四次大浪潮」並正在經歷「第五次大浪潮」的「大轉變」時代的考察，在遞交給羅馬俱樂部的報告中所得出的結論是：「人類群體思維和行動的變化就是他們的文化轉變。……文化並不局限於純文學、美術、文學、音樂和哲學，還表現為科學和技術的創造方式、對自然環境的控制。個人對美與和諧的感受以及他對世界的認同感和對世界的幻想」。在他看來，「把一個民族和另一個民族區別開來的是文化，而不是地理或自然資源遺產。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是人們的價值觀念、動機和創造力。一個國家創造現代工業、發展高技術並形成一個消費社會，另一個國家則追求趕上來並實現『現代化』，而第三個國家卻予以抵制並尋找另一種方法來發展，這三條道路是由社會群體的文化特徵和愛好所選擇的。……文化確實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決定性力量」^[2]。

二、轉型期本土文化的多元狀態

文化作為人類精神的載體，它的獨特的品質在於，雖然隨著經濟、政治的發展與更替，它的整體狀態會發生相應的嬗變，但其某種精神氣質卻一定在經濟、政治的變遷中傳承下來。正因如此，在目前的市場經濟社會中，就中國的本土文化而言，也是多元並舉的。當然，多種文化之間的主次、輕重、範圍是不同的，但它們卻同時對我們產生著影響：制約我們的選擇，規限著我們的信仰。這種多元文化大體可以歸結為以下三種。

1. 倫理性文化

如果我們對傳統文化中的儒、道、釋、法等諸多學家流派可以「忽略不計」（事實上當儒學占統治地位以後，其它的學派也均成為「儒學之補」），那麼，傳統文化可以說是以儒學為主幹的「一元」文化（這裏的「一元」是指沒有整體上和它相對立的

文化）。我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是把文化「倫理化」，因而可以稱其為「倫理性」文化。在學界的討論中，有人不同意把中國傳統文化稱為「倫理性」文化，而主張「倫理政治型」文化的提法。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因為在儒學文化的理想結構中，倫理與政治是同構的，家與國是同質的；家是國的微型形態，國是家的擴大形態。個人與國的關係是個人與家的關係的合理外推。父母相當於君王，兄姐相當於上司，妻室相當於同僚，弟妹相當於下級，子女相當於子民。反之亦然。這種文化中，所謂參與政治，主要是把用之於家的倫理情感施之於國，在家孝父母，出仕忠君王，始於事父終於事君。這就是說，人們雖然從事著繁忙的政治活動，但政治活動卻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或者說，政治並沒有像計劃經濟時期那樣對文化形成「霸權」。

人們從事的是政治活動，通貫的卻是倫理精神。所以，與其說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是「倫理政治型文化」，不如說是「倫理性文化」來得更為徹底。

當然，眾所周知，從鴉片戰爭開始，經洋務運動和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中國這種倫理性的本土文化經歷了一個土崩瓦解的過程。最初，在洋槍洋炮的轟擊下，人們仍固守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只是在器物層面上接受西方文化，試圖「師夷長技以制夷」。其後，隨著中西文化衝突的進一步展開，特別是中國在激烈的軍事和經濟競爭中失利，人們開始部分地懷疑中國本土文化的優越性，並部分地認同和學習西方文化，力圖在政治制度層面上建立起與西方相似的民主政治制度。最後，隨著清王朝帝制的覆滅和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五四」運動的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本土文化在「打倒孔家店」的旗幟下受到全面的衝擊。其間也有一些諸如「中體西用」或「西體中用」的文化調和主義，也

文化作為人類精神的載體，它的獨特的品質在於，雖然隨著經濟、政治的發展與更替，它的整體狀態會發生相應的嬗變，但其某種精神氣質卻一定在經濟、政治的變遷中傳承下來。

有一些堅守傳統文化的文化保守主義，但都無礙於傳統本土文化的整體敗落。

一九四九年以後，取而代之的是被我們稱之為「政治性文化」（下一問題論述）。但是那種倫理性文化並沒有完全消失，它以某種特定的形式仍然支配、制約著人們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市場經濟使文化獲得了相應的解放，進入市場經濟的人們面臨著古今中外多元文化的衝撞與擠壓，在這種情況下，本已被現代文化解構的傳統倫理性文化，在首先被西方後現代文化從特定的角度和意義上看好的情況下，又被不加限制的「闡揚」和「光大」，甚至大有使其「重振雄風」占據文化霸權地位之勢。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中國社會發展的一些弊端和西方已進入後發展時期一些弊端在形式上的同構性，中國傳統這種倫理性的文化，在目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十分強勁的影響，甚至成為在目前人們多元文化選擇中「行情」較高的文化形態。

由於中國社會發展的一些弊端和西方已進入後發展時期一些弊端在形式上的同構性，中國傳統這種倫理性的文化，在目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十分強勁的影響，甚至成為在目前人們多元文化選擇中「行情」較高的文化形態。

2·政治性文化

如果說，傳統社會中，政治並沒有真正形成文化的霸主地位，而是附著於倫理精神，那麼當傳統文化被整體性地解構以後，這種政治性文化便真正地形成了。基於計劃經濟社會那種特殊的社會整合機制的要求，政治佔據了整個社會結構的「中心地位」。政治權力控制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經濟活動在某種意義上是按政治上的權力關係來運行的，經濟發展的速度也是按政治目標的需要來確定的，甚至「抓革命」也能「促生產」。在這種社會中，倫理精神算不得什麼。如果說在過去是倫理精神通貫於政治活動，這個時期就正好相反，是政治精神通貫於倫理活動。一陣時期，家庭不是按血緣倫理關係組織，而是按政治關係「排列組合」。

引入市場經濟後，這種文化失去了它

賴以存在的「基礎」，但是，它卻仍然頑強地存在著。這是因為，第一，從社會制度發展上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是從長期的計劃經濟中脫胎而來，從單純的經濟制度而言，尚沒有渡過轉型期，更莫說社會的政治結構及相應的思想觀念了。計劃經濟時期所造就的政治性文化，比之於那種傳統的倫理性文化，更加直接地影響著已處於市場經濟社會的人們。第二，從社會主體的角度看，由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短兵相接」，昨天的計劃經濟和今天的市場經濟，其「社會主體」直接重合。如果說「向前看」是人的嚮往，那麼「憶往昔」更是人的情懷，更何況，有許多人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重大利益既得者，這就更加劇了政治性文化對人們精神世界的影響。

3·經濟性文化

如果傳統文化是一種倫理至上的文化，計劃經濟時期的文化是一種政治至上的文化，那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則是一種被完全「經濟化」的文化，可以簡稱為「經濟性文化」。這種文化完全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也是市場經濟時期的主流文化。這種文化，建立在對傳統倫理性文化和計劃經濟時期政治性文化的整體揚棄之上。這種文化的人性基礎，是人性惡的物質利益驅動論——支配人們活動的動機，歸根到底是謀取實物的利益；其核心是效率和效益的最優化原則；其價值取向是絕對的市場化價值取向。如果說倫理性文化和政治性文化多少還保留一些精神追求（不管是什麼樣的精神追求），因而還有一點「神聖」的成分或氣質，那麼，經濟性文化則是地道的世俗性文化，它簡直就是把文化「世俗化」了。目前的中國，如果說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精英層面，在適應市場經濟的大歷史潮流的同時，還力圖保留和堅守人文精神的操持，還嚮往著一定的精神的神聖境界及與此相應的終極關懷，那麼，大眾文化則是一種經濟性文化。在

人的本能性欲望的驅使下，這種文化幾乎完全變成了純經濟的躁動。

三、當前中國社會西方文化的多元狀貌

經過近百年的對中國本土文化從器物到制度、從制度到觀念的層層逼進和步步深入，改革開放的今天，西方文化已多姿多彩地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從文化形態學的角度看，不同形態的西方文化似乎比中國的本土文化內涵更為規範，特點更為鮮明。

1·古典性文化

所謂古典性文化，是西方的「傳統文化」。若從空間結構和文化性質上，以現在頗為流行的「傳統就是現代」或「傳統蘊含在現代之中」的方法來考察，是很難給它一個明確的規定的。但是，在文化歷史的歷時性維度上它是很清晰的，這就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前的「前現代性文化」。有學者稱其為「神聖性文化」。它以三種精神構架而成：一是希臘哲學的理性精神；二是希伯來的宗教精神；三是羅馬的法制精神^①。雖然經過以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為標示的人類精神（和文化）的世俗化運動的清洗和蕩滌，古典性文化被視為幾乎等同於「神學文化」而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但是，正像懷特海所說：「兩千五百年的西洋哲學不過是柏拉圖的一連串注腳」，這種古典性文化或被「改頭換面」（如宗教改革），或被「抽取吸納」，它的精神氣質在一定的形式中卻延流至今。眾所周知，韋伯竟然從它的身上（基督教為內核）找到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源地，從而被視為「巨大貢獻」在整個文化界引起狂狂飆巨瀾。不僅如此，在對它進行徹底否定的基礎上平地起家的現代性文化，經過幾十年的輝煌發展而耗盡能量並越來越暴露出它的不可克服的弊端的時候，古典性文化便衝破包裹它的現代化形式直接地顯露出來，緊接著，顯露出來的

古典性文化，又被以否定和清算現代性文化之弊端為使命的後現代性文化作為其價值征戰的「開採地」（這一點非常類似於「新文化保守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闡揚光大）。古典性文化終以比它的原始裝束更加光彩照人的面目呈現在當代人的面前。現在的情景，正經可以用黑格爾的「提起古希臘就有一種家園感」的名言來形容了。

2·現代性文化

現代性文化是指以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為開端的，在否定古典神聖性文化基礎上所形成的嶄新形態的文化。現在人們已經習慣於把它規定為以「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為基本內涵（這裏的「理性」相對於「神性」、「人本」相對於「神本」）。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現代性文化是伴隨「世界歷史」的形成，即世界歷史從傳統農業社會（文明）到現代工業社會（文明）的現代社會轉型而形成的，同時也是支撐現代社會轉型的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它的形成是人類文化和文明發展的質的飛躍。眾所周知，在它作為一種「文化精神」的支撐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才得以形成；資產階級正是仰賴於它所造就的現代工業生產方式，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創造了比過去一切世紀創造的整個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的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又使人類創獲了輝煌無比的社會物質和精神財富。因此，如果說古典性文化崇尚的是理想價值，那麼，可以說現代性文化完全崇尚的是世俗生活。

當然，現代性文化正是在它崇尚世俗生活的過程中，被片面地作為「工具理性」無限制地開採和徵用人類世界（物質世界、精神世界），因而暴露了它難以克服的弊端。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可以看作是對這種弊端的最有力的揭示和批判。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後現代性文化才閃亮登

後現代性文化才閃亮登場，以各種各樣的姿態和方式，甚至不惜以怪異荒誕的方式，對現代性文化尖刻諷刺、無情玩弄和激烈批判。它們試圖給人類營造一個福祉無限的新型文化。

場，以各種各樣的姿態和方式，甚至不惜以怪異荒誕的方式，對現代性文化尖刻諷刺、無情玩弄和激烈批判。它們試圖給人類營造一個福祉無限的新型文化。或至少說以某種方式在某一側面為這種文化作出自己的獨特的貢獻。

但是，正像現代性文化並不能全盤否定古典性文化的價值一樣，後現代性文化同樣不能完全否定現代性文化的價值，甚至連現代性文化在目前仍然要占據當代人精神世界的核心和主流地位這一點都不能否定。對於目前正處於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中國社會而言，就更是如此。儘管我們已經能夠理性自覺地審視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化，但佔據我們這個社會主流的，在歷史文化運作的時空中和我們所確立的市場經濟相「吻合」的，應該說仍是這個現代性文化。

3·後現代性文化

後現代性文化脫胎於現代性文化，是現代性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但絕不是「承襲」了現代性文化。它是「反傳統的」，但不是反對「一切文化傳統」，而主要是反「現代性文化」這個傳統。

一種文化，它能否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化形態，學界的認識並不統一。有人認為：「後現代主義雖然對現代性持激烈的批判態度，但它並不是現代主義文化的後繼者，毋寧說，它只是現代主義的極端化」。這種觀點陳述了三條理由，其一是後現代性文化繼

承了現代性文化反傳統的激進批判精神，像啟蒙學者反對神聖文化傳統那樣反對一切文化傳統；其二是後現代性文化並不像它所想像的那樣割裂了與傳統的聯繫，它與一些「現代文化」思潮有明顯的承襲關係；其三是後現代性文化可以看作是現代性發展的必然結果^[4]。稍仔細一點地辨析便會看到，這種觀點是自相矛盾的。第一，後現代性文化究竟是反傳統還是不反傳統？第一條理由說它「反對一切文化傳統」，第二條理由馬上又說它並沒有「割裂與傳統的聯繫」，「有明顯的承襲關係」；第二，後現代性文化到底是「現代主義的

極端化」，還是「現代性發展的必然結果」？持論者把這當作一回事來理解，但顯然這是兩個不同的命題。

在我們看來，問題就出在持論者極力想否定「後現代性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毫無疑問，後現代性文化已成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文化形態。它脫胎於現代性文化，是現代性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但絕不是「承襲」了現代性文化。它是「反傳統的」，但不是反對「一切文化傳統」，而主要是反「現代性文化」這個傳統。它表現形式上似乎是反對包括「古典性文化」在內的一切文化傳統，但它的「內在精神氣質」或「終極的目的」或「最深刻的動機」卻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層面上向「古典性文化」上回歸。

那麼，後現代性文化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文化形態，在何種意義上影響著目前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人呢？如前所述，若僅僅從「理論建樹」上而言，毋寧說，後現代性文化所主張的流浪者的思維、哲學的終結、中心的消解、基礎的塌陷、理性的殞落、結構的顛覆、價值的削平、視角的多元化、解釋的遊戲化、方法的反傳統化等等，和目前中國人的現實生活相去甚遠，因而對於有深厚傳統文化積澱和對現代性文化尚有急切渴望的中國人來說，無異於一種荒誕不經的怪異之說，只能從總體上遭到暫時拒絕和懸置。也就是說，後現代性文化之所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成為目前在人們精神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產生相當的影響的文化形態，並不是因為它本身提出了多少高明偉大的理論——在這方面它和古典性文化相差甚遠；也不是因為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多麼巨大的實際影響（它還僅僅停留在思想觀念層）——在這方面它又和現代性文化相差甚遠，而是因為它在向西方傳統文化回歸的同時，又從「外來文化」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文化十分「看好」，也就是說，它在某種精神氣質上和中國傳統文化有一些「暗

合」之處，這樣，隨著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中的價值顯現，它被中國人在這種特殊的意義上接受。

四、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博弈格局

以上只是邏輯地把文化劃分為中西兩大系列，並陳述了它們各自的「多元」。現實生活中文化卻決不像「土豆」塊一樣地作用於我們。對於中國來說，近代百年的歷史正是古今中外文化衝撞、交流與融合的歷史。中西多元文化的支流「條條道路通羅馬」，全彙集到了處於轉型期的當代中國社會之中。因此，要想探索它對人們的信仰危機產生了怎樣的作用，還須對這種文化的總體格局作出梳理。

第一，從中西文化融合的態勢看是交錯對接。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已經可以體會到，中國的倫理性文化、政治性文化、經濟性文化，西方的古典性文化、現代性文化、後現代性文化，雖然都是一種文化歷時態的「流化」，但當它們匯集到當代中國社會中，卻並不按歷史的順序匯合對接，而是錯位對接。具體地說，西方的後現代性文化對接的是中國傳統的倫理性文化；中國的經濟性文化對接的卻是西方的現代性文化；剩餘的中國的政治性文化和西方的古典性文化則有相當的「親和」之處。這是非常奇妙的文化景觀。應該說，它的主導原因乃在於中西社會發展的巨大的時代落差。

第二，從相互交融後的文化「重量」上看是外來文化大於本土文化。眾所周知，在百年的文化交流中，中國本土文化一直處於被動的地位。由於經濟落後和不斷挨打的根本原因，參照和模仿西方文化已深深地積澱到我們的心理結構，並潛移默化地成為我們的本能。在中國經濟性文化與西方現代性文化的對接中是西方現代性文化占絕對優勢。看一看如今市場經濟社會的現實生活狀態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在中國政治性文化與西方古典性文化的對接中，人們則更著眼於對特定時代的中國政治性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一個明顯的小例子似乎可以深刻地說明這一點：過去人們總是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西方的「中世紀」相比，一起進行批判和否定，可是，現在，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有在一定的意義上肯定「中世紀」的苗頭。至於西方後現代性文化和中國傳統倫理性文化的對接，雖然，後現代性文化的作用被涵蘊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之中，但是，它卻有方興未艾的勢頭。新近以來，中國文化界對西方後現代性文化的關注有增無減，決不亞於對現代性文化的探求。

第三，從文化駐足並作用於社會的方式上看是文化創新強於文化繼承。正像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一樣，無論中西古今文化是怎樣的交錯與對接，它們決不能回歸於某一文化的原始形態，一定有新的時代的因素匯入而呈現出嶄新的姿態。那種熱衷於對傳統文化的發揚與闡釋，也堅決地聲明要「綜合創新」、「現代轉換」；那種對現代性文化的追求與模仿，也決不是「照貓畫虎」、「照葫蘆畫瓢」。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是傳統文化，不僅因為它是「過去的，更因為它是「歷史悠久」的，而之所以是歷史悠久的，正是因為它所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是那樣的「大一統」、「超穩定」，因而在它的運作機制中總是傳承大於創新。然而，當代社會，經濟發展飛速，政治變革頻繁，文化轉瞬即逝，傳統文化即是被「傳承」也僅只能占「一席之地」，文化的整體態勢是「向前看」。

五、轉型期的文化選擇迷茫

文化已經如此這般，文化選擇豈不迷茫？

第一個迷茫是文化認同的迷茫。目前中國不知該認同哪一種文化。如上所述，

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是傳統文化，不僅因為它是「過去的，更因為它是「歷史悠久」的，而之所以是歷史悠久的，正是因為它所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是那樣的「大一統」、「超穩定」，因而在它的運作機制中總是傳承大於創新。

姑且我們承認目前文化的總體格局的特點之一是「西方文化重於本土文化」，那麼，僅就西方文化這條線而言，情況就令人十分尷尬：全盤接受，部分接納、完全拒絕，都一定有相應的諸如「極端的保守主義」、「溫和的激進主義或自由主義」或「當代虛無主義」等等「帽子」向你扣來！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言過其實。在他們看來，近百年來古今中西文化雖然多有衝撞，但總體，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古今文化結合並產生新的文化的過程。尤其是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成為中國社會的占主導地位的文化以後就更是如此。我們承認，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現代歷史的進程，使中國社會實現了劃時代的發展，文化也呈之以新的面貌。但是，誰能否認，歷史的實踐後果同馬克思的理論初衷之間尚有很大的距離。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看

成是中西文化之精華在實踐中的最理想的「給合」，那麼，結合了幾十年還是如此狀況，能不令人產生文化的迷茫嗎？

第二個迷茫是價值選擇的迷茫。價值觀念是文化的核心，所以文化認同的困惑必然導致價值選擇的迷茫。

價值選擇的迷茫，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層面是現實價值選擇的迷茫。人們現實生活的法律、道德、藝術、教育、乃至於維持基本生存的功利活動，都仰賴於人們的現實的價值選擇。然而，多元文化並存，給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同時樹立了多種價值標準，整個社會失去了一個至高無上的文化權威，因而人們的政治行為、經濟行為、道德行為找不到唯一的解釋標準。人們賴以解釋自己行為的文化根基發生了分裂。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是法律領域的唯一的價值標準，然而在文化多元的衝擊下，由於權力關係、親情關係甚至金錢關係（政治性文化、倫

理性文化、經濟性文化的表現）的滲透和干擾，這一價值標準卻往往失去範力，遭到扭曲，以致於人、權、法、情、錢的關係仍是市場經濟下的「熱門話題」和「理論難題」。有人說得好，如果說這種價值選擇的迷茫，在過去主要表現為選擇機會的匱乏，那麼現在卻是選擇尺度的遺失。選擇尺度的遺失，使人只能「跟著感覺走」，而當選擇僅僅依賴於感覺時，也就沒有選擇了。可見，現實價值選擇迷茫，在現實中往往有兩種極端的形式：要麼是別無選擇；要麼是「什麼都行」。兩極相斥相通，將人置身於價值選擇的「真空」狀態。

價值選擇迷茫的第二個層面是終極價值選擇的迷茫。多元的文化尚使現實的價值選擇陷入困境，也就更不用說終極價值的選擇了。一方面，目前的文化從總體上就沒有給我們很好地提供一種「終極價值關懷」。這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由於總體文化格局的「現代文化大於傳統文化」的特點，使蘊含在傳統文化中的「終極價值關懷」被淡化、稀釋、瓦解；其二是受當代「解構神聖價值」的種種哲學社會思潮的影響，目前的文化本身，就極少提供一種「終極價值關懷」。另一方面，即使目前的某種文化提供一種「終極價值關懷」，也因在文化整體選擇上的困境所限制，不能輕易地被我們所接受。

第三個迷茫是人格崇拜的迷茫。人是以個體形式存在的，但人的本質卻又是社會的，因此，人格中最基本的矛盾應是個人和社會的矛盾。如果人格已無法塑型，那麼，毫無疑問，文化必然危機。目前的多元文化都有人格的蘊含，都有關於個人、社會及其關係的看法，但是構架不同，理路不同，追求的目標更為不同。我們陳述過那諸多的「文化」，他們對人的自我形象的塑造都各有主張。比如，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忽視乃至否定個人價值的「以社會群體為本位」的文化，它源遠流長，綿延不息，從舊時代的「倫理性文化」一直延續到計

蘊含在古今中外文化之爭的底層的，實質上是人格塑造的分歧，或展開說是處理個人與社會關係的模式和路徑的分歧，因而可以說，有多少文化，就有多少人格形象，就有多少個人與社會關係的模式。

劃經濟時代的「政治性文化」之中；再如，改革開放使個性解放，極端的個人主義的現代性文化又佔據了文化的主戰場等等。蘊含在古今中外文化之爭的底層的，實質上是人格塑造的分歧，或展開說是處理個人與社會關係的模式和路徑的分歧，因而可以說，有多少文化，就有多少人格形象，就有多少個人與社會關係的模式。

六、中國文化向外傳播的基本戰略

基本要點有三。

第一，實行文化選擇的「綜合創新」，即在現代國家的理念基礎上，綜合以上六種文化的合理內核和合理要素，創立和培育真正適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形態，以實現整個社會的文化精神統攝和引領。

第二，在這種綜合創新的文化形態構成中，並不是揉成一個「文化大雜燴」（不要美其名曰什麼「文化融合」），而是要在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上，堅定不移地選擇現代性文化作為「綜合創新」文化形態的軸心。應該指出，現在的中國，現代性文化還沒有充分地展示它的生命力，便處於某種危機之中，這種狀況是極為危險的，它有可能斷送中國來之不易的現代化前程。

第三，社會轉型造成了中國文化選擇上的困境，現在中國社會，狂躁喧鬧，津津樂道於未經任何價值轉換和形態創新的所謂「傳統文化」，依據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德，恰恰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自己不都選擇，那有何理由「傳播」給別人？所以，中國文化向外傳播，不能僅只在傳播技巧上下功夫，而是要向世界傳播經過我們精心過濾和解釋、且一定適應被傳播對象需求的中華文化經典。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頁四八七。

[2] 參閱拉茲洛：《決定命運的選擇》（三聯

書店，一九九七年），頁七二至七三，重點號系引者所加。

[3] 參閱趙教華：《超越後現代性：神聖文化和世俗文化相結合的一種可能性》，載《哲學研究》一九九四年第十一期。

[4] 參閱趙教華：《超越後現代性：神聖文化和世俗文化相結合的一種可能性》，載《哲學研究》一九九四年第十一期。

The Game Pattern of Polymorphic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Choice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y

Jing Xuemin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Shi Hui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lymorphic forms of Chinese nativ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e diverse forms of ethical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e, economic culture, sacred culture, modern culture, and post-modern culture coexist and intertwine in the present Chinese society, making people trapped in the confusion and even crisis of cultural choice.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which culture to choose as the spiritual pillar of Chinese society should be solved at first for Chines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Ultimately, the modern culture based on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should be firmly chosen with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made.

Keywords: Chinese society, polymorphic, cultur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依據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德，恰恰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中國文化向外傳播，不能僅只在傳播技巧上下功夫，而是要向世界傳播經過我們精心過濾和解釋、且一定適應被傳播對象需求的中華文化經典。